

# 成舍我自由主义新闻理想的源起与嬗变

常志刚

(吕梁学院 中文系,山西 吕梁 033000)

**[摘要]**当前成舍我的研究,大多将他的从业经历与思想沉淀割裂为大陆时期和台湾时期,出于政治气候的考量,当前大陆的相关研究,极少将成舍我在台湾时期的作品文本作为考察对象。对成舍我在离开大陆之后发表的作品进行细读,结合成舍我子女的回忆录及大陆和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尝试梳理出成舍我心路历程的基本轨迹,进而揭示在历史大变局中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成舍我走上歧途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成舍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新闻理想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7)03-0111-05

##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eng Shewo's News Ideal of Liberalism

CHANG Zhiga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Lüliang University, Lüliang Shanxi 033000, China)

**Abstract:** Most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Cheng Shewo has divided his experiences and thoughts into two periods, i. e. , Mainland period and Taiwan period. The current research in the Mainland seldom includes his works produced in Taiwan due to political reasons. By examining Cheng Shewo's works produced after he left the Mainland, his children's memoirs and Taiwan scholars' research on him, this paper tries to trace his psychological world to reveal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his going astray as a liberal intellectual in historic transitions.

**Key words:** Cheng Shewo; liberalism; intellectual; news ideal

1927—1949年的中国大陆,有三种主要的思潮笼罩着整个新闻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革命报业;以保守主义思想为旨归的党国报业;以自由主义为鹄的的民营报业。<sup>[1]</sup><sup>110</sup>1949年,文化中国改天换地,海峡两岸对抗分治。一批倡导“第三条道路”的民营报业的新闻工作者、新闻教育者、新闻学者,不得不选边而立,要么投身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大业,要么追随蒋氏父子赴台为“反动大陆”出谋划策。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如胡适、林语堂一般的知识分子,在观望许久之选择奔赴所谓的“自由之土”,定居海外,潜心学术研究,不再过问政治。然而,较之于做出绝决的选择的新闻界同人,成舍我的选择多了几分犹豫。1949年4月成舍我携妻儿

抵达香港,但直到1952年年底才举家迁台定居。此间,唯一的儿子16岁的成思危与父亲彻夜长谈之后,毅然选择返回大陆,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当中。父子俩经过长时段的深思熟虑之后的“同途殊归”,长久以来一直未曾引起中国大陆乃至港台的学者的足够重视。

一如葛兰西所言,一位思想家越是好冲动,好辩论而又缺乏系统性,或者是一位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人物,或者是一位处于不断创造和经常运动过程中的、富于强烈的严格要求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有识之士,那么对他的研究,价值就越大。<sup>[2]</sup>与成舍我惺惺相惜的前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在成舍我六十大寿时赞誉道:

收稿日期:2017-03-03

作者简介:常志刚(1983-),男,山西吕梁人,吕梁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素养与社会。

“舍我先生过去四十余年的奋斗历史,它的光荣是不仅属于新闻界的。他在新闻界四十年的奋斗,影响及效果,不止限于新闻界一个圈子中间,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于整个中国。舍我先生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一位伟大的斗士,同时也是中国自由史上一位勇敢而独立的斗士。他为新闻自由而奋斗,也就是为人类自由而奋斗。”<sup>[3]210</sup>“人有人格,报有报格,一个独立、正直的报人,必定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必定独立不倚,铁骨铮铮,秉持应有的高尚的价值取向。他们监督政府、监督权贵,揭露贪腐,坚持批判精神,在这方面成舍我为当代新闻工作者树立了一个典型。”<sup>[3]26</sup>然而,此番评价是否公允?事实果真如此?须待深入探究方可论断。

### 一 新闻理想的早期建构

成舍我新闻理想产生的动机和诱因至少应该追溯到五四时期。他应北大文科选读生考试,录取入学,1918—1921年在北大读书。此间,在李大钊的介绍下,成舍我同时担任北京《益世报》编辑、总编辑。1918年冬,李大钊和一些进步人士在北京大学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成舍我参加了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的第一次集会。据吴范寰回忆,会议结束,他跑回北大东斋,和几位相熟的同学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今天开成立会了。这个主义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主义,我可不赞成。此后,再也没有去参加过”<sup>[4]</sup>可见,自青年时期开始,成舍我便从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选择,且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相当肤浅。

在1919年10月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的《新知编译社成立记》一文中,社长成舍我宣布该社宗旨为“研究学术,传播思潮,共同努力与文化运动,以图世界的根本改造。”他做了一个大而无当的计划,在一年后的《新知编译社报告书》中称,之前承诺的翻译《列宁文集》,编写《中国小说史》的计划搁浅了。后来的“新知书社”计划,更为宏伟。同样面向全校师生募股,其中李大钊出资最为慷慨,是其他股东的六到十倍。认为“救济知识的灾荒,实比救灾更重要”的成舍我,于1921年3月8日决定成立以“发扬学术,传播文化”为宗旨的“新文化书社”。李大钊亦为其总务股成员之一。他认为大学生的地位,是要在文化上有点贡献的,不是为弄张文凭,便去升官发财。他将切实的文化运动

当作“救国的唯一良法”,并开出三种从事文化运动的组织形式,即报馆、书局、大学。他将“完备的报馆,健全的舆论”作为其必生的志业。在他眼里文化运动最大的武器是报馆,这也是他毕生重点着力的事业。创办书局的理想在学校已经做过尝试,但因为计划过于庞大,后因力所不逮,最终不了了之。受蔡元培的影响,他对大学的意义评价极高。在他看来中国应该有规模宏大的私立学校。后期在北平、桂林、台湾三度创办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现台湾世新大学),完成了他拥有一所私立大学来传承自己的思想和理念的初衷。

抗战之前,成舍我的报纸采取一种折中主义的方法,明哲保身。作为一家私营报纸,他既将批评矛头指向国民党当局,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指向共产党。为了能够吸引读者,他不顾其政治色彩大量刊登批评国共两党的言论,但从基本态度看,这一阶段,成舍我基本上坚持了进步的立场,能够为大众说话。<sup>[5]29</sup>1925年2月10日,他在创办《世界晚报》10个月以后,又独立创办了《世界日报》,并在发刊词中提出:“以超党派立场争取全民福利”“以国民意见为意见”,强调言论公正,不党不偏,不受津贴,不畏强暴,替老百姓说话,作民众喉舌。然而,对成舍我收受津贴的指责却时有揭露。<sup>[6]30</sup>

1930—1931年,在成舍我结束欧美新闻事业的考察之后,他对西方新闻业的“言论自由”十分向往。在游历期间所做的《在伦敦所见英国报界之新活动》一文中,他写道:“符离街(报业集中的地方)支配着唐宁街,在词典上无‘言论自由’的吾辈中国记者观之,自不能不悠然神往耳。”文章对他的精神偶像北岩爵士,极尽溢美之词:“彼在新闻事业之成就,虽论者毁誉参半,然近代报纸,实受彼强烈之影响,举世兼然,固不仅英国已也。彼为近四十年来世界新闻事业中之一怪杰。”<sup>[3]13</sup>他批评北岩爵士,指出其提倡报纸大众化的大部分动机,多半出于资本家获利之一念,而非欲供给一般平民以何种善良之知识。<sup>[3]15</sup>在成舍我看来,“儒家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之师,居高临下,以提供专家学者的权威意见为荣”,<sup>[7]17</sup>他期待自己经营的新闻事业并不像一般资本家一样,以纯粹的盈利为目的。在《我所见之巴黎各报》一文中,他将报纸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以虽有相当言论主张,但时依环境转移无一定党派关系的营业报。一种是有某一政党之背景,或某一政党

之正式机关的政治报。<sup>[3]37</sup>他的理想非常明确,即办一张无党无派的营业报。在1932年的《中国报纸之将来》一文中,成舍我提出他对中国新闻事业未来发展的构想。在他看来,未来的中国报纸应该受民众和读者的控制;他的主权,应该为全体工作人员所共有;营业方面可以商业化,但编辑方面却应该独立,不受“商业化”丝毫的影响。由“民众”“读者”来组织监督报馆言论的机关。他反对“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的提法。“无论有冕无冕,‘王’这东西是根本不能存在的。”<sup>[3]35</sup>在他看来,报纸的言论方针应向民众公开,受民众控制。未来的新闻事业,新闻记者,只是在“民众”“读者”监督指导下的一个忠实服务者,他不能再以自己或他的主人的个人爱憎来强奸民意。然而这种思想总有自由主义者共有的毛病,“太过浪漫,陈义过高”。<sup>[7]20</sup>

## 二 大变局中走向歧途

1949年2月25日,共产党北平军管会因刊登国民党中央社电文而下令查封《世界日报》,查封之前曾通过延安新华广播通电全国,成舍我对此事耿耿于怀,按成思危的说法,这是促使他最终选择去台湾的主要原因。<sup>[8]</sup>1949年3月1日,成舍我在上海《申报》《新闻报》同时发表题为《驳斥共匪所谓查封北平世界日报的文告》,在该文稿中,成舍我回顾了《世界日报》自创办以来基本的发展历程,以颇为反讽的语气阐述共产党军管会对他的“礼遇”。“在查封诸多民营报纸之时,唯独对世界日报,不惜辞费,发表长文广播,申诉若许理由”。不禁使他“受宠若惊”。文中也提到了1945年10月发表的复刊宣言中“若国民党不能痛切觉悟彻底改革,而仍蹈故袭常,因循泄沓,贪污腐败则人民反抗势必至。”

这种一贯的、高高在上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背后,清晰地流露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在自由知识分子群体集体左转时,<sup>[9]</sup>成舍我已然自立于外,向右看齐。从一年前他的报纸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可见端倪。1948年9月5日北平《世界日报》刊载胡适的《自由主义》一文。作为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胡适认为“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他将中国古代的“自由”理解为“由于自己”。文中他还援引老子、孔子、孟子的主

张,声称中国的自由主义由来有自,并将孟子所言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定义为“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

“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风气,这是近代自由主义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此外,现代自由还有和平改革的意思,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sup>[10]185</sup>

文人论政<sup>[11]</sup>作为儒家士大夫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表现形态,1905年清廷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知识人的角色愈来愈边缘化,而报刊是知识人重新进入政治舞台的一个重要途径。成舍我作为五四一代,自有家国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然而,无论在学期间,还是从业之后,他的许多决策都有诸多“理想主义”的成分。有学者称,文人论政是民间与生俱来的一大神圣权力,是知识分子探寻真理、褒贬善恶、评判美丑,以及弘扬其自由独立意志和实现民主自由理想的神圣职能。<sup>[12]</sup>在李金铨看来,文人论政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sup>[7]17</sup>

其一,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企图以文章报国,符合“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其二,感染儒家“君子群而不党”的思想,无党无派,个人主义色彩浓厚,论政而不参政。其三,自由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关系暧昧,殊堪玩味。

成舍我的办报生涯,以上海《立报》最为辉煌。在发刊词《我们的宣言》一文中,成舍我提出“立己、立人、立国”的宗旨。他希望《立报》能够开创一种新风气,使全国国民,对于报纸,皆能读、爱读、必读,……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牢固。<sup>[3]5</sup>然而,他这里所指的“国”,都是指“中华民国”。从40年代末开始,成舍我渐渐遗忘了“文人论政”的基本传统,长期以所谓“社会贤达”身份担任国民党的参政员、立法委员。

若按雷蒙德·威廉斯的说法,作为记者的成舍我既是流放者又是流浪者。

如果一个记者足够好的话,他的报道就能既新奇又准确及时;但如果这个记者只是一个旁观者,中间派,他就不大可能深刻理解自己所记述的生活

(这个流浪者从他自己的阶级角度观察另一个阶级,因而不可避免地是从外部观察),但是一个骚动不安的社会非常容易接受此类成果:在一个层面上,这些报道新鲜猎奇;另一个层面上,当这个阶级或社会比较接近记者自己的阶级或社会,就会获得“非常具有洞察力”这样的评价。<sup>[13]</sup>

正如陆建德先生所言的“思想背后的利益”驱使,成舍我做出了最有利于自己的价值判断。然而他的“资本家出钱,专门家办报,人民说话”的理想,一如空中楼阁一般。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职业追求,也反映了成舍我的文人气质。作为曾经的“南社”成员,成舍我一直有写古体诗的习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他,自然在理念上与倡导中华文化传统的国民政府有某种内在的精神契合。

### 三 执迷不悟抑或迷途忘返

1952年末,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成舍我做出了去台湾的决定。然而早在一年前,也就是1951年3月,“王云五、左舜生、沧波先生等住在香港的朋友,出版《自由人》三日刊,相约各以真实姓名撰稿,不但没有稿费薪金,且须大家分担出版费用。”成舍我所谓的朋友除上述三人外还包括:卜少夫、陈训念、陶百川、左舜生、阮毅成、徐复观、刘百闵、雷啸岑、许孝炎等人。<sup>[5]10</sup>成舍我并没有论证遍布世界各国的“史沫特莱”们缘何如此之多。成舍我在北大读书期间倡导“文化运动”。早在1920年,成舍我便宣称:“舆论家是要往前进的,不可以随后的。他是要秉公理的,不可以存党见的。他是要顾道德的,不可以攻阴私的。他是要据事实的,不可以凭臆想的。他是要主知识的,不可以尚意气的。”<sup>[1]110</sup>然而,在自己的立场发生彻底改变之后,成舍我与自己早年的理想渐行渐远。一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促,却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所以根本没有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sup>[14]</sup>这种推理逻辑恰恰印证了陈平原先生对学生时代的成舍我的行为所做的评价,“不以思想深刻和学问渊博见长的成舍我,着力发展其组织活动方面的天赋”。<sup>[5]89</sup>

赴台之后,办报无望的成舍我只好退而求其次,通过办学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脱离自由主义阵营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矛盾体。也许小资产阶

级的软弱性可以作为一种解释,但对应于成舍我本人似乎又不这么简单。他的新闻理念不像《自由中国》派文人雷震和殷海光一般表现得咄咄逼人、决不妥协。有论者称,文化霸权主导战后从大和文化霸权中解放出来的台湾地区,报人的感知结构出现分裂,没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群体观念认同。在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普世价值认同方面均出现了较大分歧。作为来自大陆的“外省人”,成舍我自然有委曲求全,明哲保身之嫌,然而隐忍待变的成分亦不可抹杀。对蒋介石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变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期待有一个强势的统治以提早实现国家的统一。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成舍我便持“自由”应让步于“救国”的论调。在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上,成舍我并不像雷震等人一样持坚决的怀疑态度,也不在坚守言论自由、民主人权等一般自由主义分子所谓的“普世价值”。

余英时先生认为,在中国,从19世纪末至“五四运动”时期是士大夫逐渐过渡到知识分子的阶段,到了20年代末,士大夫文化基本消失了,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到了四十年代,士大夫观念已经彻底死亡。事实上,成舍我的士大夫情结一直延续到其赴台以后。以一种愚忠的姿态,扮演谏臣的角色。只可惜,在社会大变局之下的精神扭曲,使得成舍我的价值判断产生了巨大的错误!

正如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成思危评价他父亲的那样,“(他)为人心思缜密,感情深藏不露。他对甲说的话不一定对乙说,而对乙的感情又往往不愿让甲知道。因此我深信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全面地了解他,对他的看法也很难完全一致。从而对他的回忆和评述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罢了”。<sup>[8]</sup>成舍我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但作为一代报人,他选择了台湾,选择了国民党政府治下的中华民国,对他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如何给以恰如其分的描述,仍然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对成舍我的评价,在中国大陆现有的研究中一直呈现着两极分化的趋势,在贺逸文等人撰写的《北平世界日报史稿》中含蓄地指出,1947年1月21日举行的北平市立法委员选举中,成舍我有贿选嫌疑。还宣称他与蒋介石心腹大将陈诚有密切来往,甚至国民党C.C系头目陈立夫和许孝炎也对他照顾有加,更遑论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

波,蒋介石身边红人黄少谷等人,也与他过往甚密,情同手足。<sup>[4]12</sup>在1998年出版的《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一书中,诸位作者心照不宣地回避成舍我的基本意识形态倾向,在方汉奇先生撰写的《成舍我志略》一文中,也对成舍我1952年的抉择一笔带过。<sup>[5]31</sup>

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成舍我依然炙手可热。中国大陆对他的新闻教育思想、新闻业务思想、经营管理理念等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然而,如果将成舍我的前后几十年割裂开来观察,势必只是管中窥豹,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当然,如何能够对他的新闻理想一以贯之地进行阐释,这仍需要海峡两岸学者共同致力于萨特所说的“不屈不挠的博学”。<sup>[15]</sup>本文只是在这种连续性上做一初步的探讨,期待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对此做出更加全面而公正的考量。

#### 参考文献:

- [1] 李彬. 中国新闻社会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 [2] 安东尼奥·葛兰西,李鹏程. 葛兰西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20.
- [3] 刘家林,王明亮,陈龙,等. 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 [4] 张友鸾. 世界日报兴衰史[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15.
- [5]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 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6] 傅国涌. 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 [7] 李金铨. 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8] 成思危. 成舍我的四种精神[N]. 光明日报,1998-08-19(18).
- [9] 佚名. 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J]. 观察,1949(11).
- [10] 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启蒙文献选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85.
- [11] 常志刚,曹伯丽. 从中国近代“文人论政”看文学到新闻的嬗变[J]. 吕梁学院学报,2014(6):110-115.
- [12] 张育仁. 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82.
- [13] 雷蒙德·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1780—1950[M]. 高晓玲,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305.
- [14] 余英时. 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M]. 台北:三民书局1992:49.
- [15] 陆建德. 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评论集[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40.

责任编辑:李珂